

译文人物
YI WEN PEOPLE

Nicole Kidman
妮可·基德曼传

〔美〕詹姆斯·L·迪克森 著 黄渊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妮可·基德曼传

Nicole Kidman

〔美〕詹姆斯·L·迪克森 著

黄渊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妮可·基德曼传/(美)迪克森(Dickerson, J. L.)著;黄渊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1

(译文·人物)

书名原文: Nicole Kidman

ISBN 7-5327-3878-7

I. 妮... II. ①迪... ②黄... III. 基德曼—传记 IV. K837.1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2482 号

James L. Dickerson

Nicole Kidman

Copyright © 2003 by James L. Dicker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2005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5-422 号

妮可·基德曼传 [美]詹姆斯·L·迪克森/著 黄渊/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16 印张 17 插页 10 字数 160,00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7-3878-7/K·173

定价: 3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妮可·基德曼:全世界最美丽的女子,优雅而性感,内敛和妖娆的结合体,她的多样戏路及生活中的情感纠葛吸引着众多影评人和影迷的注意。本书为您历数妮可·基德曼其人、其事、其电影,她如何从一位默默无闻的澳洲演员成长为举世瞩目的好莱坞超级明星,当然还包括她与好莱坞大帅哥汤姆·克鲁斯的情生与情变……

詹姆斯·L·迪克森：美国资深娱乐记者。与好莱坞及美国音乐圈里的明星有着很好的私人关系，著书15本，全部是关于这些明星的，其中包括娜塔丽·波特曼、阿什莉·贾德，南方小鸡演唱组、菲丝·希尔。他现在居住在密西西比州布兰顿市。

目 录

第一章

早年岁月：“豆芽菜”的复仇 1

第二章

初获事业成功 20

第三章

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33

第四章

《雷霆壮志》和汤姆·克鲁斯的闯入 52

第五章

《大地雄心》：褪色的梦 83

第六章

终于，一个值得“不惜一切”的角色 111



第七章

《大开眼戒》 140

第八章

《红磨坊》一博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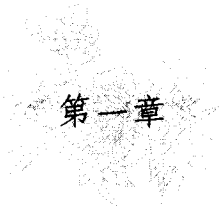
第九章

分离的日子：好莱坞式离婚 198

第十章

没有汤姆的生活 222

作品年表 241



第一章

早年岁月：“豆芽菜”的复仇

妮可·基德曼以一种最传统的方式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因为她出生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基德曼 1967 年 6 月 20 日出生在夏威夷火奴鲁鲁，父亲安东尼·基德曼和母亲珍妮尔·基德曼都是澳大利亚人。刚出生时的妮可继承了父亲的纤细红发、白皙皮肤和母亲那瓷娃娃般的精巧五官。

成年后，妮可还拥有接近父亲的身高——平时爱跑马拉松的安东尼身高 1.88 米——和像她那位女权主义母亲一样活泼好动、固执己见的个性。不过，在她刚出生时，这个脸蛋胖乎乎而且始终面带笑容的娃娃给人留下的感觉是，她仿佛会永远如此快乐下去。

妮可出生时，安东尼和珍妮尔正手持学生签证住在美国，妮可也因此获得澳大利亚、美国双重国籍。她的出生对他们来说是一份惊喜，那时他们已结婚六年，对生孩子的事本来已经越来





越不抱希望。

妮可出生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无比混乱的年代。1967年,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正因越战而陷入社会动荡之中。在夏天到来之前,已经有463,000名美军士兵奔赴越南,还有另外15,000名士兵预计会在年底前投入战斗。到1967年,澳大利亚已有大约6,300名士兵驻扎越南,年底时这一数字已增加到8,000。

在这两个国家,士兵入伍都是征兵制度强制规定的,远离家人的他们对这场战争越来越反感。10月,美国民权运动领袖小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如果政府再不结束战争的话,政府就会被人民推翻。成千上万美国人走上街头,经常采取暴力抗议方式表达内心情感。澳大利亚的情况也差不多,1967年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虽然有63%的澳大利亚人支持征兵制,但只有37%的人赞成出兵越南。和美国一样,澳大利亚人也通过游行示威和抵制征兵法令表达对战争的不满。

安东尼和珍妮尔都是反战人群中的一分子。澳大利亚的征兵制度又与美国的有所不同,他们通过类似抽奖的方式征兵。抽中却不愿参战的人有三种选择:入狱、离开澳洲去没有征兵法令的他国避难,或是通过读书来达到缓征的目的。

1967年时安东尼的兵役情况究竟如何现在已无人知晓,这主要是因为他和妮可都从未公开谈论过这个问题。不过那年他27岁,已超出征兵入伍年龄范围,因此他是为了不服兵役才来



美国读书的说法并不太可靠。妮可出生时，安东尼正拿着奖学金在夏威夷大学念书，她出生后没多久，基德曼一家便搬去了华盛顿。在那里，安东尼在全国健康中心半工半读，继续着生化博士学位的课程。

他俩在华盛顿时正遇到规模堪称美国之最大的反战游行，尽管“政治”活动令两人的移民身份都不得不遭到复核，安东尼和珍妮尔仍决定忠于自己的信念，毅然加入街头的抗议游行队伍。

妮可曾说过，她最初的童年记忆便是在华盛顿的雪地上玩雪，随后记得的便是与父母亲一起参加反战和女权主义示威游行，尤其是1969年她两岁时的那一次。她的父母亲参加了“许多的运动”，妮可骄傲地说，“他们具有高度的社会良知，两个人都是。”

尽管学的是生化课程，但安东尼那时仍未确定自己的未来职业目标。研究乳癌是他的课业主攻方向，但相比病理学他更有兴趣的是消极情感状态，例如抑郁和焦虑，会对癌症复发产生如何影响的课题。正是出于这一兴趣，他最终又获得了第二个高等学位：临床心理学。

身为护理导师的珍妮尔与他有着同样的兴趣，无论在生活上还是职业上。两人在1961年通过友人介绍认识，立即就互相产生吸引。同年，两人喜结连理，将一见钟情转化成建立在共同兴趣基础之上的成熟爱情。之后很多年中，他们也曾经经历人生的起起落落，但夫妻感情始终牢固，两人几乎形影不离。

1971年是他们在华盛顿度过的最后一年，珍妮尔又生了个女儿，取名安东妮娅。她的肤色和发色都比妮可的要深，但却有着同样具有感染力的笑容和刚毅个性。同年，安东尼和珍妮尔认为自己已在美国呆得够久，是回悉尼的时候了，回去也能让两个女儿正正经经地开始学做澳大利亚人。

* * *



几百年前，在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扎根的新居民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囚犯。但基德曼家族却是在1839年作为自由定居者从爱尔兰永久移民来到新南威尔士的，就在他们定居澳洲的一年之后，澳大利亚六个州之一的新南威尔士便不再接受外来囚犯迁入。多年之后，妮可因为无法像自己的大多数朋友那样炫耀自己祖上曾是罪犯而感到苦恼。事实上，他们家族在澳洲几乎可以算是贵族血统。

在那段岁月里，基德曼家族在悉尼及周边地区经营着不错的生意。妮可的曾祖父西德尼·基德曼还一度被称作澳大利亚的“畜牧之王”。西德尼不仅靠养牛卖牛赚了一大笔钱，在造船业蓬勃发展的那几年里，他还因为拥有靠近港口的地皮而成为造船主。不过，这一行他做得并不太如意。最终，他造的一艘船因工艺瑕疵不得不被拖去外海焚毁，他也因此赔了一大笔钱。

西德尼的下一个宏伟计划是建造悉尼港大桥，当时世界上



最长和最宽的单跨桥。它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完工，很快便成为澳大利亚国家主义的一个象征。时任首相的杰克·兰德也参加了大桥的通车典礼，一名不满澳洲独立的右翼保皇党人骑马直冲剪彩仪式现场，抢在首相之前弄断了彩带，致使澳洲王室对这座大桥的认可十分暧昧。今天，有谣言说大桥已经从内往外开始生锈，不过似乎没人对此表示太多关心。它已经在那里矗立了 60 多年，悉尼人很难想象一眼望去看不见它的情景。

妮可为大桥感到十分骄傲，经常会带美国观光客去那里参观。在大桥南面装饰艺术风格的桥头堡上建有博物馆和观景平台，一些私人公司也会提供进入大桥内部参观游览的项目。妮可不止一次被人看到站在桥上，身着标准套头衫，为游客指点着那些或许是、或许不是他曾祖父出力建造的东西。你可以嘲笑她的身高——如果你愿意的话，反正她也已经习惯了，——但你绝不可以看不起她的大桥！

安东尼和珍妮尔在 1971 年搬回澳大利亚，他们在上层中产阶级聚集的北肖特区买了一栋房子，直到今天仍住在那里。4 岁的妮可开始学习芭蕾和表演课程，6 岁时首次登台表演，在圣诞历史剧中扮演一头绵羊。母亲用旧的羊皮汽车坐垫给她做了戏服，妮可对此毫无意见。身穿“汽车坐垫”的她就像是一只真正的温顺小羊，咩咩地叫着，在舞台上紧跟着圣母马利亚。

表演并非珍妮尔替女儿挑选的惟一课外活动。作为一名热情的女权主义者，她不仅自己阅读了当时所有女性主义作



家——杰曼·格里尔、贝蒂·弗里丹、葛洛丽亚·斯泰纳姆——的著作，还带着妮可一起参加游行。她常会让女儿替她分发宣传手册，不过在妮可看来，这能否算是她的荣幸还有待商讨。毕竟，有时路人对母亲的女权主义观点都报以不屑一顾的态度。有时，妮可也会反抗母亲的这些信仰，例如有年圣诞节时，她很想得到一个芭比娃娃，但母亲拒绝了她，因为她觉得这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玩具。最终，妮可从商店里偷了一个。

尽管当年她确实偶尔会因母亲积极参加女权主义活动感到难堪，但越到后来，她越来越能用积极的眼光看待这段经历。“我从未感觉到过惧怕男人，”她在1996年告诉一个为《电讯杂志》撰稿的作家。“我父亲温柔但却坚强，是一个很好的男性榜样。因此，我一直很喜欢男人，从小到大，我并没有被灌输要仇恨男人的想法，但也从未认为自己是女人因此将一事无成。”

妮可从小就是天主教徒，每周日都和父亲一起参加弥撒，珍妮尔则独自呆在家中。尽管嫁给安东尼时她也转信了天主教（基德曼家族一直是坚定的天主教徒），但珍妮尔最终还是成为一个不可知论者。再后来，安东尼又比妻子更进了一步，干脆成了无神论者。尽管当父母的在信仰问题上一变再变，但他们没有让自己对宗教组织逐渐丧失信仰的态度影响到两个孩子。妮可和安东尼娅都被送去教会学校念书，父母亲也一直鼓励她们去教堂。

作为家长，安东尼和珍妮尔都不相信体罚，他们喜欢更加理



性的惩罚方式,相信孩子能从中得到教训。在妮可和安东妮娅犯错时,他们会把两人的部分或全部零用钱扣下,或禁止她们看电视。他们不会叱责孩子或骂她们愚蠢,骂她们是坏孩子。他们避免给孩子灌输罪恶感这一概念,因为这在他们看来并无建设性。

“长久以来,罪恶感一直被看作塑造良好品行的关键,”安东尼曾经这样写道,“人们认为缺乏罪恶感后道德就会败坏,但这么说却毫无依据。成千上万的罪行和不道德行为都是由那些曾经犯错,有过沉重罪恶感的人再次犯下的。如果罪恶感在控制人类品行方面那么有效,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品行不端?诚然,罪恶感可以被用来控制儿童的品行,但其代价和引发的情感混乱常常会大于其益处。”

安东尼和珍妮尔也没法始终控制妮可的行为,她是那么任性和固执,甚至不顾后果。但他们还是明确一点,不让女儿从小就为自己的过错背负一种罪恶感。无论她有没有从过错中吸取教训,都不让她留下羞耻感。

从某些方面来说,妮可小时候遇到的最大问题还是来自她自身。开始念书时,她已是班里最高的学生。13岁念初中时,她身高已有1.75米,实在是鹤立鸡群。

因为她长得又高人又腼腆的缘故,同学给她起了“豆芽菜”的外号。她成了班里最低等的公民,有一次,一个男同学因为被选中与她跳舞而大发雷霆,老大不愿意。她本就是最后被挑剩



下来的女生,实在没想到那男孩会有那么大的反应,这让妮可感觉受到羞辱,也为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未来感到迷惘。更糟的是,她那些金发、褐发的朋友似乎都有着完美的高度和体型。

与妹妹的对比更加剧了这种感觉,“她有着褐色的皮肤和美丽的褐发,而我在两姐妹里却平淡无奇,”妮可对《人物》杂志记者说。“我们一起上街时,人们会说,‘嘿,妮可,你妹妹真漂亮,不是吗?’”

还有她的头发,那头浓密、带卷的红发。妮可长大后,人人都爱拉她的髻发玩,这让她感到十分厌恶。她觉得自己显得笨拙和丑陋,有点像个怪胎。终于有一天,她把头发束成朝天的一束,那种狂野造型立即吸引了很多眼球,校长也直接向她发出警告。她只得按照学校要求将头发重新放下,可不久之后又开始尝试用各种颜色染发,有时甚至会选择类似彩虹的五颜六色效果,就像朋克青年一样。

尽管有这些挑战制度的做法,大体上,那时的妮可还是一个很害羞的人,给人感觉有点像女性版的叛逆青年詹姆斯·迪恩。有时她会独自去参加舞会,但到了舞厅却又不进去,而是一个人坐在外面的车子里,看着别人进进出出那些灯火通明、乐声震天、散发着青春荷尔蒙的房子,心中暗暗希望自己也能与他们更相像一些。有时,她最终会鼓起勇气走进去,但更多的时候,她会选择掉头回家。坐校车时也是一样,要是和朋友一起坐那还好;但如果某天她独自一人搭校车的话,她一路上都会保持沉



默,担心有人会提起她的鬈发或者她那张常常羞红的脸。

既然身体上有了不幸的“缺陷”——至少她自己这么认为,妮可只能在其他方面弥补。她变得比班上任何人都更大胆,更愿意接受新鲜挑战。有一次,她决定尝试跳伞,却因为珍妮尔拒绝在家长同意书上签字而告吹。还有一次,她在家长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去了地下养蛇基地,还让人把大蟒蛇放在自己肩上。蟒蛇绕住了她的脖子,幸好它并未用力一卷。妮可却觉得这很好玩。她是不可战胜的,没有什么能阻止她去尽情体会人生。

当上临床心理学家后,安东尼对儿童心理发展又有了更深入的理论研究,特别是青春期少年的心理问题。他出版了几本畅销的自助读本,探讨的都是有关解决冲突和健康生活方式的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青春期少年会通过与其他同龄人的比较来更好地了解自己,评估自己在学校、家庭和同龄人中的经历,”他在《家庭生活:适应变化》一书中这样写道。他表示,在这种情况下,青春期少年有时会明白,与他们伙伴们的父母一起生活可能要比与自己父母一起生活更加艰难。“以此作为参照物,可能会令他们更好地修正对父母的看法,甚至改变他们对待父母的态度。”

无需和自己的同龄人沟通交流,妮可就能明白她的父母确实有点与众不同,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或许还可以一直追溯到珍妮尔让她当街派发女权主义宣传册的



时候。妮可和家长之间的问题,更多的与他俩无关,主要原因都出在她自己对未来和人生不断变化的想法上。

她始终和母亲更亲,不过这可能是因为父亲不常在家的缘故。在人生是否先天注定这一问题上,她和父亲也有着重大分歧。作为心理学家,安东尼坚信人的行为可以改变命运;而妮可却觉得人生在世,好好坏坏,什么事都早已天定。有一次,澳大利亚电视节目主持人雷·马丁问她,是否认为自己可以改变命运。妮可回答说:“呃,你当然可以对其产生影响。但我确实相信人生中的一件事和一些人都是早已注定的。我父亲可能会说这是一派胡言,但我就是喜欢和他争论。”

“真的吗?”马丁继续问道。

“一直这样。我父亲是个很讲实用主义的人。通常情况下,我父母都很信奉实用主义,所以我可以偏向空想主义一些——我被允许这样。我喜欢相信那样的事,相信命运。基本上,我是个罗曼蒂克的人。”

* * *

现在回头再看妮可的童年,她幻想什么便勇敢去做,她相信命中早已注定这世上必有那么一个地方是属于她而且仅属于她一个人的;我们甚至可以相信选择演员这一行也是她命中注定的。与其说她是被自己的生活经历塑造成一名演员,更确切的